

展历史画卷 / 汇改革新潮 / 集文史精华 / 纪风云人物

1011
LONGCHENG CHUNYAN
龙城

春秋

2000

(总第75期)

- 浴血拼杀在朝鲜战场的常州儿女
- 杨尚昆视察常州大成纺织集团公司追记
- 新方志人物卷“名人效应”剖析
- 富有特色和朝气的省首批示范初中
- 谢应芳和“龟巢”草堂



武進電視大
Wujin Television Univer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 赴朝参战 50 周年

五十年前，由中华优秀儿女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进行了两年零九个月的殊死战斗，赢得了伟大的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胜利，是维护正义、反对强权的英勇壮举，是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史诗，是中国人民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建立的巍峨丰碑。

——江泽民

（摘自 2000 年 10 月 25 日《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50 年 10 月 19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一道共同抗击侵略者。

ZC42/47

LONG CHENG CHUN QIU

龙城春秋



主办:

中共常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常州市政协学习与文史委员会
常州市地方史志年鉴学会

2000年第4期

(总第75期)

出版日期:2000年11月

目录 MULU

目 录

LONG CHENG CHUN QIU
龙城春秋 2000·4

- 刊首语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50周年 / 江泽民.....1
- 历史长河 浴血拼杀在朝鲜战场的常州儿女
/常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宣传组.....4
- 杨尚昆视察常州大成纺织集团公司追记 / 高进勇.....6
- 瞿秋白教育思想对素质教育的启示 / 王文强 杨建生.....8
- 总结国共合作经验 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 陈刚.....10
- 本刊特稿 新方志人物卷“名人效应”剖析 / 高岳言.....13
- 任重道远破迷信 / 陆士伟.....16
- 人物剪影 他选择了“危险”
——访年轻博士生导师姜福兴教授 / 杨金达.....17
- 再造人生
——访常州美籍华人奇女盛邵芳 / 李昌玉.....19
- 世纪巡礼 富有特色和朝气的省首批示范初中
——记常州市清潭中学 / 高国平.....23
- 魅力来自实力
——访武进电视大学校长郝建成 / 臧秀娟.....28

展历史画卷 汇改革新潮 集文史精华 纪风云人物

《龙城春秋》编委会

名誉主任:周亚瑜 吴振祥 陈冬期

主任:章云

副主任:刘醒铭

委员:章云 刘醒铭 虞建安

王宏 王援 高国平

陈吉龙 董国强 陈才全

于留春 陈书明 蔡卫平

王淳 冷慧虹 江君杰

蒋耀 瞿晓凤

主编:章云

副主编:王宏 高国平 陈吉龙

责任编辑:臧秀娟 池银合

版式设计:平凡

编辑:《龙城春秋》编辑部

地址:常州市政府大院8号楼

电话:(0519)6636645 6626148

传真:6606388

邮政编码:213003

排版:常州电脑印务中心

印刷:常州日报社印刷厂

苏新出准印:JS-200031

定价:3.50元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面貌一新 别具风格

——记常州新区国英小学的创建/平凡…………… 31

●艺苑春秋 谢应芳和“龟巢”草堂/章公台 殷绍峰…………… 32

●史海钩沉 居官留青天美名 通儒怀济世英才

——记清代舆地学家李兆洛/贺忠贤…………… 35

隋炀帝常州建离宫/薛奇达…………… 37

近代常州的诗社/羊淇…………… 38

●八面来风 旅游景区景点略谈/黄元裕…………… 39

您想知道恐龙吗?

——常州中华恐龙园开放营运/章炎生…………… 41

编辑部简讯…………… 18

《金坛年鉴(1997~1999)》出版发行/陈书明…………… 15

●随笔园 水乡溧阳古桥多/芮金川…………… 43

又到桐庐/孟济元…………… 45

●征稿启事 《龙城春秋》征稿启事…………… 12

●总目录 《龙城春秋》2000年总目…………… 47

●图片资料 武进电视大学…………… 封一、封四

武进市前黄镇…………… 封二

常州新区国英小学…………… 封三

目 录

LONG CHENG CHUN QIU

龙城春秋 2000·4

浴血拼杀在朝鲜战场的

常州儿女

●常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宣传组

朝鲜战争爆发后，全国人民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抗美援朝热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个庄严神圣的口号沸腾了成千上万中华儿女的热血，先后跨过鸭绿江，投入朝鲜境内各条战线奋战的志愿军总人数达200万人次以上。常州市(含武进、金坛、溧阳三市)先后有数千优秀儿女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近700位常州籍烈士血洒三千里江山，忠骨永远埋葬在朝鲜。他们是常州人民的骄傲，永远活在家乡人民的心中。

与特级英雄杨根思同在一个营的耿小山，是溧阳圩家庄人，志愿军172团一营二连副连长。第二次战役中，耿小山和杨根思所在的营在长津湖畔与美海军陆战第一师展开了激战。长津湖位于赴战岭和狼林山脉之间，团团白雾每天拂晓从湖面升起，高山峻岭汇合着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和风雪。在长津郡所在地下碣隅里集结着美陆战一师前进指挥所和3个陆战营、1个坦克营，加上师属各特种兵共近万名装备精良的强敌。志愿军172团要攻占和坚守的是下碣隅里外围的制高点1071高山及其四周的一大片高低山岭。这片山岭居高临下，控制着敌军北窜南逃的咽喉公路。志愿军的重机枪就可打到敌军的简易军用机场，用步枪就可打到下碣隅里蠢动的敌人，美陆战一师当然要拼死反扑，杀开血路。

耿小山和指导员蒋滨带领着二连全连指战员，还有三连一、二排和五连、六连的指战员共同投入了主峰1071.1高地下面东山一线环

形阵地的血战。美军大批海贼式飞机，盖满了天空，无数重磅炸弹和凝固汽油弹倾倒下来，几十门大炮进行不间断的排击，二连连夜抢救起来的工事被炸翻了，掩体被打塌了，炸断了大树与灌木，连土石与积雪都一起燃烧起来。敌方成群的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冲过来。耿小山抖落了身上的断枝碎土，挥动手中驳壳枪，高喊：“注意，集中火力打坦克前后的步兵！”一批又一批的敌人，不是被打死打伤，就是慌乱地后退。还有些被志愿军打散躲在草丛和树林里的美军，也被火烧得乱窜，成了二连指战员的活靶。在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中，二连的伤亡也在不断增加，电话线被炸得寸断，有一段时间与团、营指挥所也失去了联系。耿小山和指导员蒋滨在冲天浓烟中不断鼓舞身旁的战友，呼喊着：“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坚决守住阵地！”“为祖国争光，打好出国第一仗！”最后，耿小山在炮火中倒下了，为祖国，为和平，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夜幕降临，团参谋长刘锡文将二连剩下的34人和三连剩下的28人，各组成一个突击排，重新攻上右侧小高岭，夺下了3座山头。在带领二连突击排的指导员蒋滨与排长郁怀虎先后负重伤后，战士杨大光主动站出来指挥，当他端着机枪冲向敌人时，也牺牲了。剩下7名战士，始终坚守山头，用敌人溃退时丢弃的重机枪和16箱子弹，瞄准敌人射击。6个小时内消灭了一个连的敌人。二连7位勇士歼灭美军一个连的事迹，1950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向全国作了报道。7位勇士的名

字与他们的副连长耿小山烈士的英名将永远联在一起。

曾在1948年六七月的豫东战役后荣获华东三级人民英雄称号的177团一连连长王龙保，是金坛城西方家棚村人。也就是在这次东线长津湖战役攻占死鹰岭——1519米高峰的战斗中，他和战友们一举攻占了北通柳潭里、南接下碣隅里的冰雪公路旁的一座咽喉高山，为全军分割、围歼狂妄北犯敌军主力创造了条件，又一次为人民为祖国立下了战功。

1950年11月27日深夜，王龙保带领一连翻过两座人迹稀少的雪山。正钻在鸭绒被套躲在帐篷和地坑里睡大觉的美国侵略军，做梦也没想到这时会有中国军队杀上山来，耐不住严寒的美军哨兵正在哨棚内烤火取暖。当我一连的突击组踏过深及膝盖的积雪扑向山头，用汤姆枪向帐篷和地坑里的美军猛扫了几梭子，他们还没有钻出鸭绒被口袋就做了志愿军的枪下鬼。溃逃到第二线阵地的美国兵清醒过来后，用密集的自动火器组成火网，拦阻继续猛冲的我一连战士。连长王龙保指挥排长李玉海带领一排从侧背杀上去，用手榴弹和汤姆枪消灭敌人的火力点，在一条长方形的工事里，打死了20多个美国兵。

天大亮后，敌人的火力全部展开，各种自动火器响得更紧更密。英雄连长王龙保，像头猛虎一样，在火网下穿来穿去，一身的雪花已凝成了冰甲，满脸却流着热汗。这时，东南高地上的敌人愈来愈多，而我军阵地上的人却愈打愈少了。重机枪班及时赶到了山腰，把敌人丢下的3挺50式重机枪在雪地里一线摆开，向敌人猛扫，王龙保高兴得大喊：“打得好！打得好！出国立功就要看现在！”指导员王永奎带了三排赶来接应。

争夺山头阵地的激战在继续。王龙保，这位英雄的连长在炮火中倒下了。赵殿忠排长愤怒地高喊着：“坚决把敌人反击下去！为连长、为一排排长李玉海报仇！”机枪手郑书芳，回头看看连长倒卧在血泊中，眼睛射出怒火，他不再利用地形，把轻机枪端在手里，硬是站着向沿着山沟冲来的敌人猛射！敌人在我无畏的勇

士们面前胆怯地后退了。成批的敌机来袭，炸弹爆炸的烟柱遮蔽着冬日的朝阳，但是死鹰岭高峰已经雄伏在一连的脚下了。死鹰岭埋葬了无数侵略者的尸首，也埋葬了侵略者的凶焰。

耿小山、王龙保和壮烈牺牲在长津湖战役中的近千名战友的骸骨，被安葬在下碣隅里镇北的头陵峰山上的烈士陵园。四季盛开的花朵和青松伴随着长眠的烈士，乡亲们放牧的羊群，像白色的云层一样，浮游在飞鹤山下的绿色草地上。

在常州籍志愿军烈士名单上，有5位是后勤部的担架队员、运输队员，其中一位叫薛云生，是武进邹圩人。1951年夏、秋季防御战役之后，志愿军在每个军都增编了担架团与运输团。整个后勤的总人数达到18万人，他们为战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鼓舞下，后勤战线上的广大指战员、工作人员都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战胜敌人和自然环境造成的重重困难，保证全军在阵地防御作战期间“人不缺粮、枪不缺弹”，为志愿军1953年夏季举行的强大反击战作好物资方面的充分准备。

薛云生是独生子，早年丧父，只有老母在堂。1952年参军时孩子刚满周岁。他人朝后，服从分配，不计个人得失，在23军67师后勤运输连当战士。在7月6~12日的第四次石岬洞北山的反击战中，他和运输连的战友们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往炮兵阵地送炮弹、送食品，别人扛一箱炮弹，他总是一人扛两箱；返回时背着伤员下火线。他懂得自己多吃点苦，多受点累，冒点风险，我军的炮兵就可用他扛去的炮弹多杀伤敌人，压制敌人的火力点，从而减少战友的伤亡；从火线上多背下一名伤员，使他们得到及时的救治，就是为部队多保存了一份有生力量，可减去祖国一个家庭失去亲人的痛苦。在志愿军这次反击战中，胜利夺取并巩固石岬洞北山的阵地，歼灭3500余名美军，并俘敌37人。薛云生却倒在敌人的炮火浓烟中，再也未能起来……

战争的胜利是无数烈士用生命换来的，他们的英名留千古，事迹昭后人。



杨尚昆视察

常州大成纺织集团公司追记

● 高进勇

1986年元宵节刚过，人们还欢愉在节日之际，几辆高级轿车鱼贯开进古运河畔的常州大成纺织集团公司，在花园前面的气流纺车间停下。只见最后走出车门的是一位身穿深色中山装、头戴鸭舌帽、穿戴十分简朴的老人。他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杨尚昆同志。等候在一旁的厂长周其生快步迎上前去，杨尚昆紧紧地握着周其生的手，并亲切问好。周其生请杨尚昆到会客室休息，杨尚昆用纯正的四川话说：“不用休息了，不要因我们来参观，影响你们的工作，我们边走边谈吧！”

他们走进宽敞、明亮、整洁的气流纺车间。杨尚昆边走边看，一丝不苟，仔细观察，详细询问，极其认真。身为省、市劳动模范的周其生厂长，曾担任援助巴基斯坦纺织厂安装设备的专家组组长，对纺织设备十分娴熟，颇有研究。他向杨尚昆介绍说：“气流纺纱是世界纺纱工艺中较为成熟的一种新型的纺纱工艺。自1967年捷克气流纺纱机问世以来，气流纺纱机在世界各地得到较快的发展。至1977年世界各国气流纺纱机已有211万头。而我国仅引进1.28万头，发展比较慢，而且技术上还处于气杯在3万多转，没有排杂装置，属第一代水平。1979年大成纺织公司瞄准世界先进水平，首批引进日本HS5T万头气流纺全程设备，对较短时间赶上世界各国发展气流纺这项新技术的

步伐，调整常州市棉纺锭与棉织、印染不平衡的比例关系，改变外贸品种的结构，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杨尚昆听后十分认真地问道：“气流纺比原来的纺纱有啥优越性呢？”

“气流纺的优越性综合起来有五点。一是产量高，是环纺的2.19倍至4.04倍；二是质量好，使用同等级原棉，条干好，结杂少22.5%，结棉少30.9%；三是劳动生产率高，用工少，比环纺低74.26%；四是经济效益显著，善用低级棉；五是品种适应性强，可作灯芯绒、卡其、劳动卡、装饰布等的用纱。”

杨尚昆很满意这位工人出身的厂长有条有理的叙说，笑道：“你介绍得很有条理，使不懂纺织的人，一听也能明白。”歇了一会儿，他说：“你们常州的灯芯绒很有名气，不简单！”

杨尚昆曾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副省长。期间，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参与领导广东实行特殊政策、试办经济特区等工作。所以，他对引进国外设备的经济效益十分关注。因此，他问：“引进设备的资金是如何筹措的？引进设备后的具体经济效益怎么样？”

周其生答道：“我厂整个引进日本的万头气流纺全程设备是使用1978年地方外汇贷款，外汇额度674万美元，折合人民币（本金）1014

万元，年息7%，到1980年10月还贷，计人民币1085万元，国内贷款（从属费用）人民币1056万元，年息1.8%，在1982年还款，计人民币1131万元。国内配套费用149万元，土建投资182万元，总投资为2547万元。1980年6月，我们引进的气流纺全程设备开始陆续投产，每年按平均支数15.4计算，可以生产中、低级棉纱6万件左右。这样就使常州市3万枚左右的环纺设备用于纺制60支以上的细纱，使全市纺织产品结构发生重大的变化。同时，我厂建成目前东南亚首屈一指的万头气流纺车间以后，不到两年时间，全厂总产值突破1亿元，实现利润1千万元，改变了年利润长期徘徊在340万元到350万元之间的局面，使我厂跻身于大、中型棉纺企业的行列，成为外贸出口创汇的重要工厂之一。”

“关于具体经济效益。在气流纺全程设备投产后的第二年（1981年），我厂提前50天完成全年棉纱、棉布生产计划，总产值达1.0034亿元，利润达1142.5万元，比1980年增长115.39%。全年生产棉纱92700件，比1980年增长36.3%；生产棉布1254万米，比1980年增长12.01%。1981年是我厂历史上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是引进气流纺项目发挥优势、经济成效显著的一年，也是产值、利润完成得最好的一年。因此，1984年10月，国家经委授予我厂‘引进技术改造现有企业全优奖’。”

杨尚昆听后，满意地点点头。然后，跨着矫健的步伐，全神贯注地观察着一台台HS5T型气流纺机，他对前纺的配棉、混棉、开清棉并梳棉、并条等每一道工序都认真仔细察看，并不时向身旁的周其生提出问题，以求甚解。

周其生为杨尚昆不耻下问的高尚品格所感动，力求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他表述：“气流纺与环纺比较，其前纺部分省去了粗纱工序，直接用棉条上气纺机纺纱；采用了开清棉工序的开松及除杂作用，从而减少了气流杯中的积杂，降低了断头率；梳棉工序部分采用双联梳棉机，对纤维束进行充分梳理和混合，并进一步除带纤维杂质，提高了成纱质量。”

在参观气纺工序时，杨尚昆又详细询问了

其工艺流程情况。在返回的路上又问道：“你们是家纺老厂，有多少年历史啦？”

“1921年8月建厂的，至今已有65年历史。原先是由著名爱国实业家刘国钧先生创办的，以前叫大纶纱厂、大成公司、大成一厂，‘文革’后改为常州国棉一厂。”

“哦，”杨尚昆点了点头，肯定地说：“现在比过去发展得更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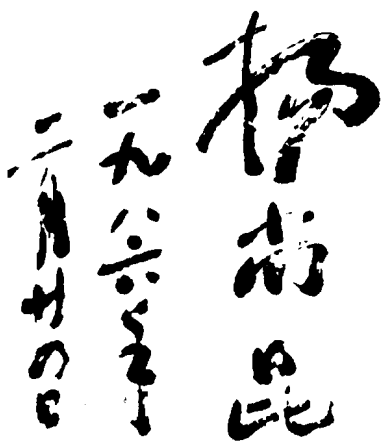
周其生坦然而言：“是的。解放前与解放后是无法比较的。就拿1985年与解放初期的1952年相比，我厂棉纱产量就增长了5倍，棉布产量增长了9倍，环纺锭增长了近2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0倍，实现利税增长了6倍。仅‘六五’期间，就累计为国家提供8400多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半厂，而固定资产原值，相当于解放初期1952年的4个大成一厂。”

杨尚昆慈祥地笑了，欣慰地说：“你们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我很高兴！”

进入休息室后，周其生请杨尚昆题词留念，杨尚昆笑吟吟地说：“要得。”于是，稳健地走到安放文房四宝的桌前，提笔挥毫，写下“杨尚昆 一九八六年二月廿四日”苍劲有力、笔透纸背的墨迹。

临别时，杨尚昆紧紧握住周其生的手，热忱而谦逊地说：“今天耽误了你们不少时间，表示感谢。同时，请转达我对全厂三千多名职工的问候。当你们取得更大成绩以后，我再来参观学习。”

杨尚昆的座车已经驶远，人们把目光从远处收回来，猛然，眼前缀满花朵的梅枝，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晶莹剔透，皎洁如雪，清香飘逸，高洁纯正，这难道不是杨尚昆同志高尚气节的真实写照吗？！

A vertical calligraphy piece in black ink on a light background. The characters are written in a bold, expressive cursive style. The main characters are '杨尚昆' (Yang Shangkun) written vertically. To the left, there is a date '一九八六年二月廿四日' (February 24, 1986) also written vertically.

一

在瞿秋白有关教育问题的论述里，常见与当今“素质教育”有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有些思想见解今天依然显得新颖独到，令人惊喜。这些见解大多反映在有关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法原则、考查方法等方面的论述中；或者反映在由他直接撰写的文稿中，更多地反映在由他主持制订的《苏维埃教育法规》里。

《苏维埃教育法规》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历史文献，收集了30年代前期由苏维埃中央政府及其所辖教育人民委员部制订的十几个教育文化类重要文件，包括命令、决议案、纲要、大纲、章程、简章、办法等等。从文件内容、发布时间、文笔措词乃至封面题签等判断，这一文献的制定发布与瞿秋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

系。当年在工作上与瞿秋白特别亲近的徐特立、刘华、庄东晓等人的回忆都已证明了这一点。刘华、杨之华等还明确提到瞿秋白在苏区亲自执笔写过一个“苏区文化教育工作计划”，其调查研究、征求意见、开会讨论、修改印发的过程也记得很清楚。综合起来看，瞿秋白应与《苏维埃教育法规》的所有文件都有或多或少的关系；有的文件与他的关系更为直接。其中第一篇以教育人民委员部名义修正发布的《教育行政纲要》（原名“教育工作纲要”）和第五篇同样以教育人民委员部名义颁布的《小学课程教则大纲》可能与瞿秋白的关系最为直接。

二

在瞿秋白心目中，对于少年儿童新一代的培养教育，是要实施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

瞿秋白教育思想对素质教育的启示

王文强 杨建生

的，只不过当年的认识和表述还未能像今天这么清晰明了。

五育并举，难在落实，贵在落实。瞿秋白主持制定的苏维埃《小学课程教则大纲》在课程设置和课时分配等基础环节切实保证了五育的真正落实。比如它非常重视“游艺”课（包括唱歌、图画、游戏、体育等），强调“小学的一切课目都应当与游艺有相当的联系”，并提出明确要求：初级小学的游艺，要发展儿童的艺术才能，使能从模仿进到自动的创造，并养成集体生活的习惯，发扬革命奋斗的精神。高级小学的游艺应培养并发挥儿童艺术上的创造性，以及集体行动中的自我组织能力，较好体现了诸育联动、互为促进的关系。

苏维埃教育的德育目标是全面而深刻的。它不

仅强调受教者需要“适应”、“服从”外部环境并养成某些共性的一面，譬如阶级友爱、集体生活、遵守纪律等等；而且针对地主、资产阶级的奴性教育，尤其重视少年儿童良好品性、独立人格和创造精神的养成亦即注重学生个性发展的一面，譬如要求学生“能够厌恶和改正懦弱的性格，吐弃投降困难的卑怯的性格，能够有辨别是非的判断力，不盲从，不机械地服从命令，了解无产阶级的民主集权的意义等等”。应该说，这样的德育观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更加有利于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培育，对于今天的德育工作具有突出的启示意义。

三

学校课程设置直接影响学生的知识结构，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知识的内化状况和整体功能。因而从课程设计和课时分配等方面，颇能显示设置者的培养意图和自身水平。与瞿秋白有关的若干课程设置方案，充分显示了他对培养发展学生全面素质的重视。

他为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设置了20种必修课目和9种选修课目，涉及专业、工具、职业技能和其他相关知识，反映出若干鲜明特色：第一，兼顾专精与渊博、纵向深入与横向拓展，尤以知识要求的广博性和新颖性令人注目。譬如，在一、二年级开设文学概论之后，再在三、四年级开设美学概论，既是加深，更是拓展。在一、二、三年级开设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的同时，还在一、二年级开设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再在三年级开设选修课艺术史，以利于奠定宽厚扎实的专业基础。第二，重视方法论和工具性课程。把逻辑学及科学方法论、外语（两门），以及应用性较强的言语学、修辞学、历代文评（并及世界文学）、古籍校读法、教育学概论等提到重要位置。从中可见瞿秋白对于培养学生创造能力、掌握科学方法和应用能力的重视。第三，注意现代科学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趋势，开设包含边缘交叉学科内容、文理兼容的综合性课程，如心理学及社会心理学、历史哲学等。

苏区《小学课程教则大纲》设置了体现五育并举的小学课程：初级列宁小学（“前期”三年）：国语、算术、游艺；高级列宁小学（“后期”二年）：国语、社会常识、科学常识、算术、游艺。其中国语包含政治（最浅易的叙述革命常识、乡土地理、革命历史等）及自然（浅易的叙述理化及生物生理卫生的常识）；游艺包含唱歌、图画、游戏、体育等。

除上述完备的课内课程外，还有“课外教学（劳作及社会工作）”的实践课设置要求：初级小学每周劳作实习和社会工作各6小时；高级小学每周劳作实习和社会工作各6~8小时。瞿秋白等在六七十年前已经看到校内校外、课内课外两相结合的重要性并因地制宜地切实付诸实施，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对今天同样具有突出的启示意义。

四

在教育原则方法方面，瞿秋白等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宝贵启示。

瞿秋白为上海大学各系共同设置了“现代政治”的选修课。他说，其实这是每周一次的“自由讨论研究”，学生或者也可组织研究会并聘请导师。这种“研究会——导师制”强调“要多与学生机会自己发表意见，讨论答辩”，以利于学生以一个公民身份，将所学的科学方法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避免死读书的死记硬背。瞿秋白强调说，如果没有这种课目和这种教授法，那末上海大学也就不成其为人民的大学了。

苏区的《小学课程教则大纲》规定了小学教授方法三原则，即“小学教育与政治斗争的联系、小学教育和生产劳动的联系、小学教育及儿童创造性的发展”，充分体现了对理论联系实际和儿童创造性发展的重视，并在三原则指导下批判和确立了若干教则方法。

它批判了旧教育的灌输式和机械记忆，强调必须采用启发式，充分发展儿童自动能力和创造性，绝对禁止强迫命令甚至敲打手段。

它批判旧教育对科学知识的呆板分割，提倡采用“混合和统一教授的方法”，拿实际生活里的整个现象做对象，显示它的各个方面之间的联系（例如加法与乘法的密切关系等），显示一切现象的不断变更和突然的变动（例如风、雷的现象，植物的生长和果实的降落等）。

它强调小学教育必须运用“从具体到抽象”的教法。指出应当从叙述和描写客观的现象，逐渐归纳引导到科学公律和概念；要从文艺性的记叙文和描写文进到议论文；要充分发挥教材中直接从实际生活里采取来的具体的故事、事实、人物的作用。

它强调儿童教育必须运用“联想”的公律，先了解儿童已有的旧观念，逐渐引导他们进到新的观念；必须把一切课目同课外的社会工作和劳作实习联系起来，引导儿童知识和能力的发展，从新的知识进到自动的创造行动。

教育原则方法实质上是一个人才培养模式问题，是教育日常工作中人们接触最多的一个

（下转第22页）

总结国共合作经验 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陈 刚

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两次国共合作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几乎贯穿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的始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尽管两次国共合作在诸如背景、目的、方式及斗争策略上各有所不同，但对中国革命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两次国共合作都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里，但其性质却有所区别。第一次国共合作时（1924年），正值中国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协同”侵略时期，国共两党都面临着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军阀统治，统一中国的紧迫问题，因而在此基础上进行合作，其性质是革命统一战线。第二次国共合作则是在中华民族矛盾上升到主导地位的背景下形成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挑起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不到三个月东北三省沦亡，日本局部侵华开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尽管蒋介石政府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但由于人民的抗日怒潮风起云涌，加之共产党的艰苦努力，国民党最终还是被迫与共产党合作。这次合作的目的在于实现全民族抗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因而这次合作的性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两次国共合作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实现的，中国共产党在两次合作中都起到了主导作用。与之相反，国民党则充当了两次合作的破坏者和终结者的角色。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各方面都比较稚嫩，不仅缺乏较高的理论修养，而且更没有各种斗争的经验，带着“二七”惨案的教训，寻求与国民党合作。尽管中共当时还十分弱小，但仍对孙中山提供了许多帮助，如：派李大钊、林

伯渠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积极参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竭力团结国民党左派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坚持民族革命立场，虽然拥有根据地和一定的军事实力，却也经历了护法运动等屡次失败的打击，此时孙中山深切地认识到妄想利用一派军阀打倒另一派军阀来取得革命的成功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表现出了革命的热情和主动性，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功不可没。第一次国共合作从酝酿到完成较为顺利（仅用一年半时间），但第一次国共合作持续时间较短（从1924年到1927年），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从此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同时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被国民党一手破坏掉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则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道路，它不是在平等协商的前提下，而是在激烈的谈判和斗争的前提下完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国民革命的洗礼和国共政治、武装十年的斗争，有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政治上已经成熟，并且有着较为丰富的斗争经验，更为可喜的是，拥有自己的军队和根据地。当日本侵略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共产党能深明大义，不计前嫌，派周恩来等同志多次与国民党商谈联合抗日事宜，先后经历了“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三个阶段，最终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是组织者，是合作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而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大

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尽管中国共产党竭力与之进行谈判，但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才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致使第二次国共合作于1937年9月才最终形成。抗战胜利后，由于国内阶级矛盾上升到主导地位，国共关系逐渐破裂。1947年春，蒋介石限令中共撤销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代表团，封闭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国共关系完全破裂，第二次国共合作不复存在。

三、两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各不相同，并且都经历了复杂的内部斗争。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是三民主义，它是国民党的政治纲领。虽然三民主义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基本上是相同的。但它同共产主义也有不同，即民主革命阶段上一部分纲领不同，宇宙观不同，革命彻底性不同。随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不断深入，国共两党的分歧必然日趋显露。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中国国民党章程》规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组成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党。在这样的政党中，由于各阶级所代表的利益不同，因此在革命过程中必然存在着阶级利益冲突和由谁来充当统一战线领导者角色的矛盾。正因为如此，尽管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党内合作，但我们绝不能忽视其内部斗争的复杂性。1925年7月戴季陶先后抛出《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反动小册子，鼓吹阶级调和，强调不同的主义、团体不能联合，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5月又提出《整理党务案》，其目的是削弱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领导权。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还不够成熟，以陈独秀为首的年轻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顽固派咄咄逼人的进攻一再妥协退让，基本上没有予以还击，犯了严重的右倾主义错误，致使我党遭受惨重的损失。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其合作进程是通过谈判来实现，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来约束双方，双方是

以1937年7月15日中共送交给国民党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9月23日蒋介石发表的实际上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来宣告实现第二次合作。显然这种合作的形式是松散的，是党外合作，是一种不完善的合作，无形中给双方以广阔的活动空间。加之国共两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根本对立，这表明从合作实现那时起就预示着其内部斗争会相当激烈。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国共双方必然面临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选择。当时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控制着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命脉，拥有约200万军队，企图利用优势地位来支配共产党，这当然是共产党所不容许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所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较第一次国共合作更为广泛的阶级基础，除极少数汉奸、卖国贼以及一部分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外，都包括在统一战线内部，然而参加抗战的各阶级、各阶层其经济政治地位不相同，他们对抗日的态度也不尽一致，都想把统一战线纳入自己的政治思想轨道，特别是国共两党都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两党之间斗争更为错综复杂。国民党既想投降又不放弃抗日，既要反共又不敢彻底破裂，政治态度呈现出两面性。

需要指出的是，两次国共合作内部斗争的焦点都是阶级利益支配下的领导权问题，第二次国共合作最为明显。蒋介石为了排挤共产党于1939年1月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多起摩擦和惨案，如山东博山惨案、湖南平江惨案以及后来的皖南事变等等。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同的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灵活多变的斗争策略，以斗争求团结，运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对国民党的蓄意挑衅给予了坚决的回击，保证了政治、军事上的独立性和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

四、两次国共合作在组织形式的稳定性和政治地位的平等性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由国民党、共产党及苏联顾

问鲍罗廷等共同起草的，并规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除了李大钊、毛泽东等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外，共产党人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农民部的部长。不久在中共的倡议下，国民党创建了黄埔军校，由国共两党共同派人担任政治和军事教官，以后又组织了统一的国民革命政府和北伐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且由于是党内合作，因此双方政治地位基本上是平等的。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双方各有自己的政权和武装，没有统一的国防军和统一的国防政府，也没有联合的统帅部，没有成文的共同纲领和固定的组织形式，这就增加了国共合作的不稳定性，抗战一开始，就出现了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分歧。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控制着国家政治经济命脉，拥有大量的军队，不给其他党派以平等的权利，对共产党更是采取敌视、限制以至“溶化”和消灭的反动方针，致使摩

擦与反摩擦的斗争持续不断。共产党在抗战初期仅有一块陕甘宁根据地和约4万人的军队，力量较弱，曾经提出组织民族联盟，实行党派平等合作，或改组国民党，但蒋介石都不同意，妄图实行“溶共”政策，把共产党统一到国民党里去，不容许共产党的存在，显然，双方的政治地位是极不平等的。

两次国共合作中尽管出现这样那样的波折，最终都由国民党破坏了，但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两次国共合作都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当前，香港、澳门已顺利回归祖国，预示着台湾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我们坚信按照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构想，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国的完全统一一定能够实现。

《
龙城
春秋
》

征
稿
启
事

2001年，是《龙城春秋》编辑部和常州市政协学习与文史委员会携手合作，联合办刊的第一个年头。值此新世纪到来之际，我们首先衷心感谢广大作者、读者对本刊物的青睐和爱护，同时热忱希望作者和读者们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促其迅速成长，再创新的辉煌。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认真把握联合办刊

这一契机，扎扎实实做好组稿、编辑和发行工作，力争使刊物面貌不断改观，质量进一步提高，声誉和影响更加广泛。为此，特发征稿启事如下：

一、注重挖掘地域特色的文史资源，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为弘扬历史文化、宣传改革开放加彩添墨。

二、注重人物宣传的力度和深度，征集配发人文史料图片，逐步形成本刊物人物宣传特色。

三、注重为现实服务，组织知名度较大单位的形象宣传，做到图文并茂，扩大影响。

四、力争与省内外兄弟刊物建立协作网络，尤其重视与中西部地区所办刊物开展组稿交流，宣传少数民族地区人文景观、民俗风情，增加知识性、趣味性。

五、本刊物发表的文章不受地域限制，欢迎外省市作者赐稿；文体提倡精品化、多样化、大众化、通俗化，除文艺类作品外，其他文体一般不限。

六、恳请作者严把史实关，提倡文责自负；要求来稿字迹端正，切忌一稿多投；稿件无论采用与否，均不退还，请自留底稿；稿件一经采用，即发用稿通知单和稿酬。

七、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职业、详细通讯地址及电话号码。寄常州市政府大院8号楼三楼《龙城春秋》编辑部收。联系电话：0519-6636645。

新方志人物卷“名人效应”剖析

●高岳言

第一部社会主义地方志书面世后，因其历史跨度大、资料翔实、结构严谨、装帧精美而备受世人瞩目，而如此皇皇巨著中最先引起反响的，则是志中的人物卷。人物卷已成为读者领略地域文化的第一阶梯，不少读者对新志的兴趣，大多由此开始。这不能不使人深思，并从中领悟到：

“人物”是弘扬地域文化的“亮点”

古今史书大多重视对人物的记述，究其原因，是人物蕴含着强烈的文化魅力。自宋代起，地方志书普遍开始设置人物传，并继承了正史“传”的形式，增加了“录”和“图”，一直沿袭至今。人物传成为传承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起着其他专题内容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常州市志》中人物传的编纂自搜集资料始，就不断产生着一种“名人效应”，名人的后代、知情者、人物研究工作者都给予极大关注，踊跃提供资料。有些多年生活在海外的名人后代，陆续回乡寻根、投资、建公益性设施。志书出版后，不断派生出多种配合地方精神文明建设、爱国主义教育的书籍和文化设施。其中如开辟常州名人馆、洪亮吉（含洪深）纪念馆、（唐）荆川公园、刘海粟美术馆，开放一批著名人物如孙星衍、盛宣怀等的故居，早先已有的瞿秋白、张太雷纪念馆，则升格为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立了多个研究名人的团体；出版了如《常州革命英烈》、《热血》、《悠悠赤子情》等以名人故事为主要内容的普及读物；一批过去宣扬较少的人物，如董亦湘、恽雨棠等烈士的传记，则通过《中华著名英烈》丛书向全国推荐。在“名人效应”带动下，还编纂出版了

人物传的“延伸产品”——《天南地北常州人》一书。该书搜集在世的1000名在外地（包括在海外）的有影响的常州籍人士的简历，汇编成册。其中有科学院院士、高级工程师、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领导人、卓有贡献的企业家、文化名人等，不仅联络了入编人士的故乡情结，也促进了常州人热爱故乡的自豪感和建设常州的积极性。

优秀的地域文化是沟通乡情的桥梁

《章学诚遗书》中有“邑志尤重人物”的说法，不少方志同仁也从大量旧方志的构成中得出“古来方志半人物”的共识，其原因不难从方志人物所产生的“名人效应”中获知。这种“名人效应”，实质上是方志人物所蕴含的地域文化精华，是乡土教材中最能激励故乡情结的部分。

志书人物传最大程度地展示了从古至今为本地、为国家、为民族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的精神风貌，使人们全面、系统地了解本地人文荟萃、人才辈出的历史，在自豪、亲近中拉近与名人的距离，从而激励读者热爱家乡、建设家乡。《常州市志·人物》中的传主除广为传颂的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等多名革命先烈外，也收录有2000多年前分封延陵、三次让国的季札，抗倭英雄唐荆川，在常州城内浴血抵抗英国侵略者“洋枪队”的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中国最早的人口论学者洪亮吉，主撰《永乐大典》、时称“两脚书橱”的明代大学问家陈济，著名诗人黄仲则、赵翼，实业家刘国钧等。这些人不仅在常州、而且在全国都十分著名。

志书人物传的传主，不是在志书中列上一

个名字、写上几句简历,从而彪炳千秋的。后人纪念已故名人,最大愿望是为吸收其传统精神,学习其人格魅力,因为这是本地先人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是亲切的乡音,最易被乡人、特别是青少年所接受和仿效。

人物入志无论从历史或现实来说,都极具实际价值。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程中,需要有榜样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已随着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逐渐由对革命先烈的学习扩展到对历史上各个阶层的爱国人士、功绩卓著者的学习和借鉴;寻求常州的发展,需要借助乡情的纽带,争取外地常州籍人士的力量;常州成为开放城市后,对外交往需要运用乡土人文情结的沟通,在吸引一批名人后裔关心家乡、建设故土的同时,展示常州优良的人文环境,扩大知名度。实践证明,乡情的桥梁作用,是其他因素无法取代的。

为续志打开多彩的话题

志书人物卷产生的“名人效应”,不但使社会进一步肯定了地方志的历史作用,也为续志如何编纂人物传留下诸多话题,引出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是定位问题。人物入志古已有之。今天加以审视,使人更深地体会到这是尊重历史、尊重人在历史发展中主观能动性的问题。人们常讲“历史是人创造的”,“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的首要因素”。编志之初,也反复强调这一观点,但实际操作中又往往不能到位,在人物筛选及编写中受身份等级、功过评价、正面反面、得失褒贬等一系列问题的困扰,写人物传如履薄冰,人物的位置、分量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影响。由于是第一社会主义方志,对人物的“存史、资治、教化”功能的认识不那么充分,加之历史跨度大,人物可选范围广,出现一些不足是难以避免的。志书续修中,这些问题的解决,应该是可以预见的。因为续志时限相对较短,政治上的争议不再是主要话题,修志者的思想也得到极大解放。把人物定在一个重要的位置来写,是时代要求,也是修志者报效桑梓的实际行动。

二是品位问题。司马迁是在史书中为物立传的首创者,他写传记以文学笔法见长,人物栩栩如生,绝无造作之感。方志人物传不主张用文史合璧手法记人,但有些问题不能不加以研究。笔者曾以《常州市志·人物》为蓝本编写人物故事,就遇到一些令人一筹莫展的尴尬。在诸多人物传中,传主的言行举止、音容笑貌等展现人格魅力的素材实在难觅。若据此编写“乡土教材”,其“教”力无疑削弱大矣!全志所记人物335名,粗计一下,其中32%属履历式,即生卒年月外,就是曾经任过何种职务;26%属成就式,即曾经出过何种成果;42%属职务加成就(职务也常带某种成就色彩)的复合式。三种类型中均较少见到能反映其道德情操、人格魅力、精神面貌的内容。是不是这些人不具备这些因素?显然不是。举几个例子:《常州市志·人物》也记了瞿秋白高唱《红军歌》、《国际歌》,高呼革命口号走向刑场的视死如归的感人精神;恽代英严正拒绝敌人劝降,痛骂蒋介石屠杀革命志士、献媚帝国主义罪恶行径的英雄气节;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李公朴坚持斗争、舍生忘死的大无畏气概;教育家谢荫昌力争收回日本人控制的南满教育权的凛然正气等等,读来常使人有热血沸腾、心潮难平之感。但这种记述显得过少了。并不是说要把人物传写成报告文学,而是应摒弃平面式记述方法。很多情况下,读者不但想知道历史是什么样的,还想知道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为此,编志者要尽可能多选择和保留一些传主身上能够拨动读者情感之弦的东西。

三是层面问题。旧志人物传基本上是职官、节妇唱主角。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志虽然开阔了入志人物的层面,但重点还是放在担任过相当官职的人身上。续志所记时限内,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阶段,出现了“科技兴国”、“教育兴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趋势,符合时代要求的大批高科技人才、教育家、企业家脱颖而出,这些人进入续志人物传势在必行。续志人物传要开拓层面,不能不在这些风云人物身上做文章。另外,首部志书人物传中的反面人

物主要是对敌斗争、政治斗争中的阶级敌人，续志人物传中的反面人物，可能首选的是那些从领导岗位上堕落的腐败分子。这样做，未尝不是一个警世之举。

四是生不立传问题。续志时限跨度有限，加之人类寿命的延长，按“生不立传”的原则，可能入志人物会逐渐呈现寥若晨星的局面。纵观这几年文坛上不断推出的传记文学，生人立传比比皆是，社会效果也很好。读者除了认为少数史实不准确外，少有对这种做法持否定态度的。方志界能否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改革时代风起云涌，各个领域人才辈出，生人不能立传的规矩事实上受到了挑战。细察这个制约原则，除感受到修志者的一番良苦用心外，也看到由时代背景造成的三个不能对入传人物“盖棺论定”的原因：政治的、成果的、生卒年月的。说起政治原因，在改朝换代、政治动

荡、战争频仍的年代，人们因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随风云变幻大起大落，今朝是朋友，明朝可能成敌人；今朝为座上宾，明朝可能落个阶下囚。生人特别是名人，只要未曾作古，就难以预料若干年后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这种困扰，在较短的续志断限内，似乎不难“定格”。至于成果的“盖棺”问题，翻看古今志书的人物传，都很难说“全”，只能是个相对完整的概念。最后一“难”，是生卒年月，这在入传人物身上只是个小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严格选择一批对改革开放有突出贡献的在世人物，为其立小传、传略，以扩大入传人物的层面。当然，不以“传”为题，也不是没有出路，如可以按“简介”立人物。因为不入传，不等于不能入志。在立传问题上，不论是“生人”或“故人”，只要当权者不谋私，修志者不徇私，入传者不丧志，传主的选定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金坛年鉴(1997~1999)》

出版发行

●陈书明

由金坛市人民政府主办，金坛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金坛年鉴(1997~1999)》10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1月8日开始发行。这是金坛市自1994年以来编纂出版的第三部综合性年鉴。设有31个类目，195个分目，903个条目，共88万字，全面记述金坛市1997~1999年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和重大事件，图文并茂，可读性强，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编者精心设计了“金坛解放以来主要年份经济指标”、“各乡镇村基本情况一览”等图表，突出反映金坛50年的光辉历程和

业绩；增设“城市管理”、“荣誉栏”、“企事业单位选介”等类目，系统反映全市两个文明建设的新进展、新成就和新经验；实事求是地记述有关大案要案、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三家非银行金融机构挤兑风波和股金兑付等社会热点问题。该书还介绍金坛籍“两弹一星”功臣钱骥和34名省（部）级劳动模范先进人物事迹，刊登市四套班子领导人的简历、获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名单；对全市撤乡并镇、制定“十五”计划和2015年规划等大事也作了适当记载，为社会各界了解和研究金坛市情提供了最新的信息资料。

在偶而一次聚会中，原在宣传部工作的朋友说了这样一件事：今年春节，他回故乡溧阳省亲，亲眼看到“出会”的场景。前面是国旗彩旗开道，继而是扛着信仰无神论的已故伟人画像，紧接着是抬出供奉在本村庙宇里的几尊菩萨，敲着锣鼓，浩浩荡荡地出村口，绕大道，在附近村庄田间“出会”，以求神明保佑，风调雨顺。明友说：这类迷信怪现象如此张扬，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就个人所见，就是在热闹的市区，在堂堂文明校园的墙脚边，在和平路和红

梅路或热闹街市或僻静林荫下，几乎每天都可以见摆摊看相算命的主儿。有的是“常摊”，摆开“瞎子算命”的样儿；有的不过20岁左右的女青年，在地上摊一张写上“看相”两字的硬纸板张扬。城管部门管过一阵，仿佛是几只麻头苍蝇，你一赶，它就飞走，转几圈又转回来了，为什么？因为它也有“市场”。常有好事者前去向卜占卦。可见，沉渣泛起自有其泛起的环境气候。

迷信从理论上说，它与唯心主义是一对孪生子。是在旧时代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下的畸形产物。原因之一是过去老百姓没文化、少文化，生活艰辛，渴望精神支柱，形成一种落后的社会意识；另一方面是有人制造迷信，用来谋取政治利益或骗取钱财。可以这样说：迷信的核心，从本质上讲向来是利用迷信形式以行诈骗勾当。从街面上设局的小骗子到李洪志、胡万林、沈昌等大骗子，什么耳朵认字、穿墙识物、意念搬药，到“信息水”、“信息茶”等等夸大到可治百病都是骗局。《焦点访谈》曾播过沈昌制作“信息茶”作坊的镜头。把几角钱一斤的茶梗子，雇几个人手，分装成一两二两的小包，然后以几十元上百元的价格卖给人。前一阵沈昌还神气活现地要与揭露其骗局的记者打官司，真到法庭开审，他就溜之大吉了。

迷信的“沉渣泛起”，以至发展到以李洪志、胡万林之流为首的邪教抬头，残害百姓，除了社会原因之外，其中善良人们的软弱、容忍，让欺人的人一次次得手，更有人为其张目，提供任其“昌盛”的表演舞台也是一个原因。鲁迅先生早在《朋友》一文中揭示：“暴露者揭示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胡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受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因为这，所以使戏法专存于天地之间，也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鲁迅：《花边文

任重道远破迷信

●陆士伟

地之间，也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鲁迅：《花边文

学》）正因为这深层次的缘故，敢于揭露骗局、勇于揭露迷信的人们，如中科院何祚庥院士等一度受到法轮功痴迷者的围攻、谩骂。同时，颇为中庸的“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在容忍、忍让中使迷信的病菌繁衍又繁衍，使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力量胡蚀又胡蚀。以致城乡山坡广修庙宇，重塑金身，店铺里赫然供奉财神，出租车里挂起伟人像避邪，以致一些地方官员带头到寺庙里撞钟，全国各地举办什么盛会、庆典，重大工程落成仪式都要定在8点28分揭幕，车牌号码凡“8”字可以高价竞卖，凡“4”字可以削价抛售……如此等等，让人心寒。还是鲁迅说得对，如此“用迷信来转移别的迷信，所以归根结蒂，并无不同，以后尚能用正当的道理和实引——科学来替换了这迷信，那么，定命论的思想，也就和中国人离开了”（引自《且介亭杂文·运命》）。

好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与李洪志之流的法轮功邪教的斗争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可以肯定，无论是古的沉渣，还是新的沉渣，只不过是翻着筋斗漂上来，以显示其存在罢了。也正因为由此泛起，让人更能看清其本来面目，其最后的命运，仍旧是要沉下去的，因为沉渣终究不过是沉渣。当然，这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任务。